

黃種人帝國的異種族「仇恨」與「親密」： 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

摘要

本文藉由日治時期四個日本作家分別取材台灣泰雅族原住民薩拉茅事件（1920年）與霧社事件（1930年）等抗日事件的文學創作——佐藤春夫〈霧社〉（1925年）、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1931年）、大鹿卓〈野蠻人〉（1935年）、及中村地平〈霧之蕃社〉（1939年）——來探討這些台灣原住民再現中「野蠻」與「文明」之間充滿曖昧與矛盾的辯證過程，是如何呈現出日本帝國的種族論述在西方視線下的屈折性質。主要探討的問題為：異種族「仇恨」與「親密」這兩個極端關係的糾葛，以及種族、性與自然等因素在其中的交錯，如何環繞著官方殖民論述與政策、作家的「原初」憧憬與帝國批判，以突顯日本種族論述的內在矛盾性。

本文討論的結果發現，日本作為後進黃種人帝國，自身的種族同化歷史經驗與創傷心理，使得日本文化人以屈折的方式，對台灣原住民與其文化感受到詩意、浪漫、誘惑、讚嘆與同情，想像或嚮往另一種有異於現代（西洋化）主體的可能性：即與原始自然、部落共同體與傳統合為一體的「原初」存在。然而，他們在挑戰既有種族論述之同時，也仍受到種族身分與所處時代的限制，不由自主地複製了西方種族論述的內在結構與邏輯。

關鍵詞：原住民抗日事件，佐藤春夫，山部歌津子，大鹿卓，中村地平

Interracial Antagonism and Intimacy under the Japanese Empire:
Japanese Writer's Representations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Revolt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four Japanese writers' literary texts on Taiwanese aboriginal riots, exploring how the dialectic process of "sav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se texts reflects Japan's ambivalent position as a "colored" empir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nest of issues: how does the intertwining of the two extremes of interracial "antagonism" and "intimacy," along with the intersections of race, sex, and nature inherent in it, demonstrate the inherent ambivalence of Japanese racial discourse that hightens the tension betwee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licy and the writer's criticism of which out of Primitivism.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raumatic psychology of Westernization in a late, "colored" empire created complications in the attitude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regarding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On the one hand, as evinced in their romantic sympathy with and poetic admiration of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they imagine or lo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ubjectivities other than modern (Westernized) subject: i.e. as primitive existence closely united with nature, one's own racial community and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confined by their own "colored" racial stance and the racial thinking of the era, they still unconsciously replicate the inner logic and structure of Western racial discourse.

Keywords: aboriginal riots, Sato Haruo, Yamabe Katsuko, Oshika Taku, Nakamura Chihei

前年（2010 年）為霧社事件發生 70 週年，在台灣、日本都舉行了紀念學術研討會，針對這起日本殖民統治歷史中最震驚世人的台灣原住民反抗事件的歷史、記憶與再現進行探討。在去年，電影《賽德克·巴萊》的賣座更帶動台灣社會一般民眾對於霧社事件的關心。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時帶來的強大震撼，除了兩次霧社事件¹死傷慘重（包含日本人與原住民雙方），日本動員軍隊與使用炸彈、毒氣瓦斯等現代兵器進行鎮壓之外，主要來自於當時日本人已經統治台灣 35 年、卻在原本被認為相當有治績的霧社發生這樣大規模且具有種族滅絕意圖的抗日事件，使得耗費無數人員與財力的「理蕃」政策與事務、甚至整個殖民統治方針的適當性都受到質疑。為了否認殖民統治的缺失，總督府警務局的官方報告書中歸結認為，除了霧社小學宿舍建築木材搬運之導火線，還有大大小小 11 個事件遠因，其中「蕃人的本性」被列為首要原因：

蕃人在吾等官憲不厭倦的撫育教化之下，近年來雖然呈現大幅進化，但其血液中潛在的傳統性，並非在短期間內就可以煙消雲散。平日像貓一樣的他們，一看到流血慘事的剎那便會失去理性，潛意識瞬間燃起，其外貌的粗暴變身以及行動的敏捷，畢竟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69）

官方報告書首先表示，原住民在「撫育教化」下已有「大幅進化」，以宣傳「理蕃」政策與事業的成果，但繼而將原住民的突擊歸因為其「血液中潛在的傳統性」，也就是難以根除的種族粗暴本性。事實上，早在日本統治台灣 20 年前發生的牡丹社事件（1871 年）與台灣出兵（1874 年）當中，² 台灣原住民的「野蠻人」種族刻板印象早已經透過《風俗畫報》等新興的報紙雜誌大眾媒體，滲透到一般日本民眾之間。日本開始殖民統治台灣的 1895 年，伊能嘉矩、田代安定創立了台灣人類學會，運用具有科學宣稱的西方普世性學術語彙，建構人類學學術體制以生產各種種族論述。具體而言，日本人類學者沿襲馬偕等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自然史文化演化論的知識論基礎，「將地方社會紛雜的人類社群現象，分類編

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促使筆者進一步深化論點，僅在此致謝。本論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殖民地台灣種族關係的文學再現(II)」(NSC98-2410-H-005-051-)之部分研究成果。

¹ 霧社事件隔年 4 月，第一次事件時擔任「味方蕃」、協助日人討伐的道澤群攻擊賽德克族生還者，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道澤群為了替戰死的族人復仇，並預防日後受到賽德克族報復，遂在日人煽動與默許下夜襲收容所，賽德克族生還者被殺死及自殺者共 216 人。

² 1871 年，到沖繩本島的首裏王府朝貢完畢踏上歸途的宮古島船隻，遇到颱風漂流到台灣南部的八瑤灣（現在的屏東縣滿洲鄉），船員當中五十四人被排灣族原住民殺害，此為牡丹社事件。1874 年日本以此為藉口出兵台灣，迫使朝貢宗主國清朝承認琉球王國為日本保護下的領土。關於台灣出兵事件作為明治日本模仿西方帝國霸權的方式、支配亞洲「未開」民族以建構現代「文明」國家之性質，可參照 Eskildsen 2002。

入種族的全球普遍性知識架構中」(陳偉智 2009: 1-35)。

然而，日本身為後進黃種人帝國，處於西方白種人帝國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的尷尬位置，在種族自我定位上從一開始便充滿了曖昧與矛盾。坂野徹(2005)曾透過日本人類學者對自我種族的定位從「日本人種」向「日本民族」轉移的歷史過程，檢證日本人種論與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認為，1884年伊能嘉矩的老師坪井正五郎創立日本人類學會之後，基本上沿襲歐美研究者所提出的日本人種交替論與混血論，³ 並以混血論作為日本有利於海外擴張的先天條件。然而，從明治中期至後半，「民族」一詞開始在日本印刷媒介上出現與流通，配合國族主義的高漲，標榜日本人在文化與歷史上的高度統一性，建構民族一體性的國族論述(坂野徹 2005: 75-105)。也就是說，由於考古學研究顯示日本人起源於複數人種的混血，難以宣稱生物學上的單一「日本人種」，於是便轉而標榜日本在文化與歷史上的「民族」同質性，以進行國家統合。然而，此一「民族」認同作為日本現代國族主義之統合原理，背後卻有著揮之不去的有色人種自卑情結，以及日本民族文化在急速西化與現代化下消逝的危機感。

大約在同一時期，日本取得第一個殖民地台灣，展開異種族統治。正如西方帝國的海外殖民地種族接觸經驗，不僅影響其對於其他種族的想像，同時也與帝國的現代國族認同建構有著密切關係；⁴ 同樣的，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種族接觸經驗，與日本本國的國族認同建構也有著密切的關係。面對與日本同屬北方蒙古人種與漢文化圈的台灣漢人，日本殖民當局以「同文同種」的論述加以懷柔，進行「舊慣」(既有習俗)的民俗調查；至於不屬於漢文化圈的南方蒙古人種台灣原住民，因為在文化與人種亞型上與日本人差異較大，則被建構為不同種族的「野蠻人」，成為殖民地人類學研究與治理的對象。然而，作為有色人種帝國，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異種族接觸關係，折射了日本籠罩於西方人種與現代文化底下的複雜種族認同。

本文將藉由四個分別取材台灣泰雅族原住民薩拉茅事件(1920年)與霧社事件(1930年)等抗日事件的文學創作——佐藤春夫〈霧社〉(1925年)、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1931年)、大鹿卓〈野蠻人〉(1935年)、中村地平〈霧之蕃社〉(1939年)——來探討日本作家的台灣原住民再現當中，「野蠻」與「文明」之間充滿曖昧與矛盾的辯證過程，是如何呈現出日本帝國種族論述在西方視線下的屈折性質。⁵ 本文選擇這四個文本進行討論，主要是因為在這些作品當

³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與學校為了學習歐美的現代學科知識，延攬歐美學者前來日本進行研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等人根據《日本書紀》、《古事記》的記載，提出日本列島曾發生日本人祖先征服原住民(有愛奴人或克魯波克魯人兩種說法)的人種交替論。從中可觀察到歐美研究者沿襲西歐社會透過人種與民族征服來掌握人類史的歷史觀，以及他們對於日本「文明」的高度評價(坂野徹 2005: 82-83)。

⁴ 馬丁·唐頓(Martin Daunton)與瑞克·赫本(Rick Halpern)在研究大英帝國與殖民地原住民的專書當中也指出，現代歐洲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除了受到歐洲國家間的競合與相互定位之影響，各國在海外殖民統治過程中與殖民地土著民族的種族接觸經驗也扮演重要的腳色(Daunton and Halpern 1999)。

⁵ 尤其是，相較於日本人以「同文同種」論述來籠絡同為蒙古利亞人種、同為漢文化圈

中，作為人種與文化同化手段的異種族兩性關係與抗日原住民討伐日人的種族對決緊密交錯，製造出具有張力的多義性種族關係。

針對這四個文本的先行研究，以蜂矢宣朗對佐藤春夫與中村地平的研究揭開序幕。蜂矢宣朗（1991）針對佐藤春夫〈霧社〉中的旅程與相關人事物進行詳盡的考察，並將中村地平〈霧之蕃社〉放在其所謂「南方憧憬」的脈絡下一併加以評論。邱若山（2002）承續並檢證蜂矢宣朗的研究成果，指出佐藤春夫〈霧社〉富含異國情調的筆觸下，對於殖民地社會與民族等議題的關切。河原功（2004）對於霧社事件文學再現的研究，則以〈霧之蕃社〉為日本第一個直接以霧社事件為題材的文學創作。阮文雅研究中村地平的博士論文（2005）當中，討論〈霧之蕃社〉對於霧社事件的原因與經過之描寫，如何呈現出他對台灣原住民同時具有南方憧憬與種族歧視的曖昧情感。李文茹、楊智景與邱雅芳三位的博士論文則將討論範圍擴及《蕃人來薩》、〈野蠻人〉等較少受到關注的作品，並從兩性關係的角度探討日本人與原住民的異種族接觸。李文茹的論文（2004）以帝國女性和殖民地支配為主題，認為〈霧之蕃社〉呈現了帝國男性東方主義視線當中內含的性別歧視；針對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的討論，則指出作者除了從社會主義思想的角度對日本的原住民統治進行批判外，並打破帝國論述中日本人與原住民之間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進而提出「原初文化」與「科學技術」的相對關係。楊智景的論文（2008）探討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殖民地／台灣再現，綜合性地分析了大鹿卓與中村地平作品中的原住民女性再現，認為日本殖民者視其需要將原住民女性視為柔順或性放縱，以維持其殖民地權力關係與架構。邱雅芳的論文（2009）同樣以日本作家的台灣書寫為探討主題，認為佐藤春夫的〈霧社〉賦予原住民女性兩種極端化的形象：如孩童般的天真無瑕與散發肉體魅惑及原始野性之存在；中村地平的〈霧之蕃社〉則接受了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官方觀點，並突顯原住民暴動的「非理性」層面。

綜觀以上的先行研究，雖然多有意識到文本當中日本人與原住民的異種族兩性關係、日本人對原住民女性的多義性再現、以及兩者之間的種族與性別權力關係，但卻並未能留意兩者之間戀愛或結婚的親密關係與抗日事件的種族仇恨之間的張力，以及日本的種族論述背後屈折的自我認同，因而難以從根底來動搖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種族論述。因此本文將探討這些文本當中，異種族「仇恨」與「親密」這兩個極端關係的糾葛，如何超越「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在生物學的「人種」差異與歷史文化的「民族」差異之間進行複雜的辯證。在這些作品當中，台灣的原始山林不只是異種族接觸與關係發生的背景舞台，更是原住民種族文化重要的成分與表徵。人類學者凱·安德森（Kay Anderson）在回顧種族研究的論文當中曾提到，種族歧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分析種族的「錯誤」概念如何被塑造，更需要探討將「人類」與「非人類世界」（nonhuman world）區分開來的概念（Anderson 2008: 155-71）。本文將著眼於文本中的「自然」如何介入

的台灣漢人，日本人強調文明與野蠻「差異」的原住民種族論述，特別能顯示出日本自身種族論述的屈折性質。

殖民地種族與性的交錯關係之中，以呈現日本種族認同建構的內在矛盾。

一、「恐懼與誘惑的複雜交錯」：佐藤春夫的〈霧社〉

佐藤春夫的〈霧社〉取材自作者 1920 年 6 月底至 10 月中旬旅遊台灣時的親身經歷。⁶ 作者 9 月中旬正準備經由霧社前往能高山登山，卻在集集的旅館聽說霧社發生原住民抗日事件，前往霧社途中也目睹各地警察被召集至埔里準備前往討伐的情景。雖然遇到這樣的緊急事件，佐藤春夫在民政長官下村宏的禮遇之下，仍由支廳派人護衛他前往能高山。從山上回到霧社後，他遇到兩個原住民姊妹，在姊姊的引導下進入她們的住屋，卻在門關上後感到強烈的威脅與恐懼而倉皇逃出。

佐藤春夫旅遊當中所遭遇的抗日事件為發生於 1920 年 9 月 18 日的泰雅族薩拉茅部落抗日事件。事件經過大致如下：18 日半夜一點左右，六十名薩拉茅部落原住民突然包圍能高郡合流派出所放火，兩位巡查及其妻子、一個兩歲男孩及腹中胎兒都分別被砍頭或殺死。21 日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的第七版即以「挖開孕婦腹部 將胎兒砍頭 他們為非人野獸 薩拉茅蕃的凶暴」這樣聳動的標題加以報導。

佐藤春夫以此事件為本的〈霧社〉一開頭，便對在集集聽到的傳聞——「霧社的日本人因為蕃人蜂起而被滅絕（皆殺し）了」——表示存疑，理由是霧社為蕃地的第一大都會，居住有至少百人以上的日本人，「因此該社的蕃人應該也不會那麼野蠻才對」（佐藤春夫 1925: 2；2002: 149-50）⁷。後來在埔里，佐藤春夫才確認出事地點為薩拉茅部落，被殺的日本人為七人。從霧社山麓小店的女老闆口中聽到事情詳細經過後，佐藤春夫表示，事件中明明有一個目擊者倖存，傳聞卻將其誇大為日本人被「滅絕」。同時他也數次強調，傳聞中說「日本人」被滅絕，而沒有使用殖民當局所教導的「內地人」一詞；因為相較於「內地人」指向的空間與民族差異，「日本人」一詞強調了人種上的差異與對立。佐藤春夫強調傳聞中「日本人」與「滅絕」的語彙選擇，認為這突顯了日本輿論將原住民抗日事件導向具「種族滅絕」意圖的嚴重衝突。

然而，佐藤春夫遊記當中與原住民的實際接觸經驗，卻與傳聞中「凶惡蕃人」對日本人的「種族滅絕」仇恨相去甚遠。途中相遇的原住民以簡單日語跟他打招呼，旅館的原住民女侍天真無邪，對他桌上《台灣蕃族誌》裡的原住民照片大感興趣，讓他興起「對余之愛犬所懷抱的」親愛感情（佐藤春夫 1925: 12；2002:

⁶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詩人、小說家與評論家，生於和歌山縣新宮，慶應義塾大學中輟。初期於[以下日文標題請附翻譯]《スバル》(SUBARU)、《三田文学》等文學雜誌上發表詩歌與小說〈西班牙犬の家〉而受到矚目，1918 年在谷崎潤一郎推薦下進入文壇，接連發表《田園の憂鬱》、《お絹とその兄弟》(阿絹與其兄弟)、《美しき町》(美麗的小鎮)等作品，與芥川龍之介並列為引領時代的兩大作家。

⁷ 〈霧社〉文中引文翻譯皆為筆者自譯，但另附上中譯本頁碼以利讀者查考。

163)。佐藤春夫尤其藉由登山途中日本少年警手⁸與原住民的良好互動，呈現能高山林中種族關係的平靜與和諧，以對照霧社街道因抗日事件與討伐造成的種族恐慌與騷動。九州出身的日本少年警手為了排遣山中生活的無聊，以打獵、學習原住民語言為樂，相當融入原住民的生活。在登山途中，少年警手跟同行背負行李的「蕃丁」或是偶遇的狩獵原住民開玩笑，對樹上的山鳩放槍；進入森林之後，並藉由山中回音與原住民進行「友伴」（仲間）的對話。他也轉述原住民說的「鹿的胃當中一點也不髒，只有美麗的樹木新芽而已」、「男人只負責狩獵、戰鬥與祭祀」（佐藤春夫 1925: 19；2002: 170-72）等話語，表達原住民與原始山林的自然與生物密切結合的生活型態、宗教與群體生活，讓他感受到無限的哲理與詩意。

在這原始山林中，「能高的人們幾乎沒有提到薩拉茅，就好像這件事完全不在他們思緒當中似的」（佐藤春夫 1925: 20；2002: 173）。宛若在原始與清新的大自然當中，種族的差異與權力關係不復存在，不管是日本少年警手或是原住民，都成為與山林融為一體的純真存在，超越種族藩籬進行自然的感情交流。當少年警手調侃背負行李的原住民腰間的「蕃刀」是砍人頭之用時，對方馬上加以否認，表示那是用來砍樹的。警手並向佐藤春夫補充說，原住民非常討厭受到這樣的誤解。正如此一插曲顯示的，台灣原住民與大自然共生的傳統生活模式與宗教信仰，受到外來種族（也包含日本人之前的漢人）從「人類」與「自然」對立的現代文明觀點貶抑為「野蠻未開」。但在佐藤春夫詩意的筆調下，能高山林與大自然共生的生活模式與和平人際關係，對於將原住民與自然視為需要馴服的「未開」、「野性」這樣的現代種族論述，提出了省思與批判。

在〈霧社〉結尾，佐藤春夫更藉由博物館代理館長森丑之助（M氏）之口，批判日本人「文明化」外表無法掩飾的「野蠻」本性。替他規劃台灣旅遊行程的森丑之助對台灣原住民表達人道主義與文化尊重的觀點，將薩拉茅事件的原因回溯至 10 年前佐久間總督征討的不當高壓政策。再過了幾天，討伐的軍機失事墜落，之後有號外報導尋獲駕駛員屍體，但屍體的頭顱與生殖器被割下。得知這樣的消息，森丑之助面帶憂鬱地對佐藤春夫表示：

原本蕃人殺人時，其目的絕對不在殺人本身，他們只不過是為了一種宗教的迷信而想要得到人頭而已，如果可以獲得人頭甚至會刀下留命。如今他們以剖開孕婦的腹部、切斷死人的生殖器之類在他們宗教上毫無意義的殘虐行為為樂，但事實上這樣的風俗在他們的固有習慣中是完全不存在的。這樣的所作所為恐怕不是他們祖先傳來的習俗，大概是從某個外來種族那裡學來的新蠻風。唉！事情終於演變到此一地步了。（佐藤春夫 1925: 33-34；2002: 189）

森丑之助在《台灣蕃族誌第一卷》當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原住民獵人頭的

⁸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沿用清朝以來的「隘勇」制度，以防備原住民的出草攻擊。1920 年，將「隘勇」改稱為「警手」。

習俗。他認為，「從文明人的角度來看，未開人類的獵人頭惡習在人道上是不可原諒的罪惡，但在他們蕃人的社會當中，反而是以一種道德觀念來加以重視，將此行為視為神聖，蕃人相信獵人頭為祖宗的遺訓」。他並強調，原住民獵人頭的目的非常單純，就是為了取得敵人的首級，而不是為了擊潰、攻擊、侵略敵人或是掠奪敵人的財物（森丑之助 2008: 314-15）。而在佐藤春夫的遊記〈霧社〉當中，他更基於對原住民獵人頭習俗的理解，判斷薩拉茅事件中日本警察妻子被剖腹取出胎兒、胎兒頭顱被砍下帶走、日本派去討伐的軍機駕駛員頭顱與生殖器被割斷等殘虐行為，並非原住民固有的習俗，而是他們跟「某個外來種族」（意指日本人）學來的「新蠻風」。相較於前述大眾媒體將抗日原住民妖魔化為「非人野獸」的種族論述，森丑之助說明了原住民獵人頭習俗其實具有「宗教」與「道德」的民族文化意涵，而非「野蠻」人種的罪惡，並批判日本人在征討原住民過程中不具意義的殘虐行為，才是真正的野蠻表現。

值得玩味的是，〈霧社〉結尾報導軍機駕駛員屍體的頭顱與生殖器被割下的號外，似乎是出自於佐藤春夫的虛構。軍機墜落事件本身確實存在，10月4日討伐薩拉茅部落的軍機在雪山坑溪墜落，警部遠藤市郎殉職死亡。此為日本殖民統治以來第一次出動軍機進行討伐，卻發生墜機意外，因此報紙上將殉職警察加以英雄化，連日報導尋獲殉職警察的屍體、加以運回並舉行盛大葬禮等經過。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兩名駕駛員中的倖存者在墜機後發現另一名警察當場死亡，搜救隊動員原住民協助找到飛機殘骸與屍體時，發現旁邊有包含孩童在內的數名原住民之足跡，飛機墜落時並將一株粗大的橡樹壓斷等（1920年10月9日第七版）。然而，報導中卻沒有出現〈霧社〉一文當中駕駛員屍體頭顱與生殖器被割下的相關記載。如果號外已大肆報導，照理來說即使是《台灣日日新報》也無法封鎖相關消息，況且這樣的殘虐行為正可利用來宣傳原住民的兇殘暴力，官方報紙沒有理由刻意隱而不報。依此推論，〈霧社〉當中的號外報導內容，可能是佐藤春夫的虛構。⁹

藉由遊記這種「眼見為憑」的文類特色，以及號外報導與人類學者專業知識的「真實」宣稱，佐藤春夫在〈霧社〉結尾對台灣原住民殘虐行為的「虛構」，獲得「真實」的效果，佐證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之主張。佐藤春夫對於種族論述「真實」宣稱的逆向操作，不但批判了日本殖民當局以「野蠻」種族論述掩蓋殖民統治暴力，也間接突顯了日本人種族認同建構的內在矛盾：為了擺脫西方的人種歧視視線而徹底「西洋化」後的日本，藉由殖民地台灣原住民的「未開人種」，建構自身作為「文明人種」的認同，卻反而暴露出自身的「蠻風」。

此外，遊記中作者在霧社街上與原住民母女的相遇，則呈現了種族同化與交混過程中，「人種」與「民族」差異的複雜辯證。佐藤春夫抵達霧社不久，便遇到一個帶領著四、五十個「蕃丁」前往搬運糧食的「奇異的人物」：

⁹ 佐藤春夫在另一篇台灣遊記〈殖民地之旅〉當中，也刻意將林獻堂寫成林熊徵。旅遊書寫的文類本身的特色之一本身就是真實（親身見聞）與虛構（浪漫的想像與探險性質）難以劃分，請參見 Clark 1999: 1-3。

她笨拙地結著舊式底髮，¹⁰ 身上穿著廉價染織布的內地風單衣，穿著草鞋——不像其他人打赤腳，腰間綁著看似女性用的寬幅腰帶。她的衣服像男性穿法般沒有在腰間折疊以調整長度，還短得露出手腳。那是因為這個人異常高大。因為抬頭挺胸著甚至給人威風之感，腳、身高以及姿勢、態度有點像男人，但看起來跟其打扮一樣是個女人。等對方接近後一看，雖然有點可怕，不過骨架容貌果然是女人，而且，雖然作日本人——應該說內地人——打扮，卻是個蕃婦，臉上有著刺青。(佐藤春夫 1925: 10; 2002: 160)

根據旅館主人的描述，該女性與第一個來到霧社的日本人結婚，日本人卻在調職其他地方時拋棄她，支廳出於同情和顧及日本人顏面而雇用她為翻譯。由該原住民女性的年齡以及有兩個混血女兒的資訊來看，應為 1896 年與日本「蕃通」近藤勝三郎結婚的霧社群巴荷社頭目女兒尤娃莉羅拔歐(ユワリ・ローバオ)。¹¹ 在佐藤春夫筆下，尤娃莉羅拔歐在外表上做日本女性的髮型與打扮，呈現她與日本人通婚的種族(血液與文化)同化與交混經驗留下的痕跡。然而，「異常高大」的人種身體特徵、抬頭挺胸走路的威風姿態，卻與其日本女性外表相當不協調。尤其是身材的高大造成她以男性的穿法穿著女性服飾，加上她以日本官方翻譯的身分為權力表徵，大聲命令、指揮同族男性，在種族與性別兩方面均令人難以辨識。走近之後，雖能從「骨架容貌」與臉上的刺青，確認其「蕃婦」種族性別身分，但仍給人「可怕」之感。

異種族親密關係的種族同化與交混，使尤娃莉羅拔歐成為種族與性別的「奇異」存在，透過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謂的諧擬(mimicry)過程，生產出與日本人「幾乎相同，但又不完全一樣」的主體，「透過雙重視界揭露殖民論述的曖昧矛盾性，並干擾其權威性」(1994: 86-88)。尤娃莉羅拔歐的「奇異」諧擬形象，除了諷刺性地批判了日本人的種族同化政策(呼應遊記中對於「蕃童」教育的批判)，同時也屈折地折射出日本人自身的種族建構矛盾：日本人表面上的「西化」與「文明開化」，無法改變其有色人種的血液與「野蠻」本性，只能淪為西方白種人的「奇異」諧擬。

佐藤春夫與尤娃莉羅拔歐的兩個女兒具有強烈性暗示的接觸過程，則進一步揭示了種族界線的不可逾越性。在得知原住民姐妹的身分後，佐藤春夫推測「那

¹⁰ 明治 30 年左右到大正初期流行的女性髮型，特色為使用假髮讓前面與兩鬢頭髮像屋簷般突出。

¹¹ 1909 年近藤勝三郎入贅娶了荷歌社頭目之妹，拋棄了尤娃莉羅拔歐。關於人稱「生蕃近藤」的近藤勝三郎的生平經歷，可參考 Barclay 2005: 340-41。佐藤春夫〈霧社〉裡的旅館主人描述該日本人為「巡查之類的人」，在調職其他地方時拋棄了原住民女性，則混雜了被近藤勝三郎的巡查弟弟近藤儀三郎拋棄的狄娃絲魯道之背景。蜂矢宣朗也認為與佐藤相遇的這名原住民女性為尤娃莉羅拔歐，但同時混雜了狄娃絲魯道、以及被下山治平拋棄的貝克道雷之經歷(蜂矢宣朗 1991: 18-21)。邱若山則從佐藤春夫對於該原住民女性外貌與體型之描寫，推測其為狄娃絲魯道(2002: 136-38)。

個少女之所以對於內地人的我如此表示善意，可能是因為她身上有一半內地人的血液吧！」然而，少女關上房門後，他聽到母親尤娃莉羅拔歐在門外抱著嬰兒唱搖籃曲，「但不是我們的語言」（佐藤春夫 1925: 24-25；2002: 178），原本展現普遍性母愛的搖籃曲，也讓他揣測是否為試圖攻擊身為日本人的他之暗號。此時少女輕挽他的手臂，讓他突然「被完全原因不明的恐懼所襲擊」：「讓我感到如此恐懼的，是這個真貌不明的少女週遭、以及這個家本身的陰森氣氛。我現在離門這麼近，也許房屋深處有什麼人也說不一定。說不定會有拿著刀的蕃人突然出現——雖然理性否定這樣的想法，但很難不產生這樣的心情」（佐藤春夫 1925: 25；佐藤春夫 2002: 179）。原本對大女兒想親近日本人的心情表示理解的佐藤春夫，一旦被關在密閉的黑暗空間中，便突然意識到原住民少女作為異種族通婚政策的悲劇產物，其存在本身即凝聚著對日本人統治者的怨恨。他開始暗中希望原住民姐妹只是單純的賣春婦，而不是種族攻擊的誘餌。此時，他先前懷疑與否定的官方種族論述中野蠻、仇日的「蕃人」形象便化為「妄想」。正如瓊尼·內格爾（Joane Nagel）在討論西方帝國與有色人種的種族與性接觸時指出的，「異種族的性關係交界（ethnosexual frontier）是個富有異國風情但不穩定的社會空間，以及暴力爆發的豐饒場域」（Nagel 2003: 55）。在抗日事件的種族緊張關係影響下，佐藤春夫與混血原住民姐妹之間帶有性意涵的種族接觸成為「恐懼與誘惑的複雜交錯」（佐藤春夫 1925: 30；2002: 184）；在此一「異種族的性關係交界」，種族界線看似能夠藉由通婚與性行為輕易跨越，但實際上，在既有種族知識結構結合殖民統治暴力的狀況下，它已經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

川本三郎曾探討佐藤春夫雖然在代表作《田園の憂鬱》、《美しい町》（美麗的小鎮）當中謳歌東京歷經歐洲化、充滿人工之美的田園與自然風光，但仍念念不忘位於日本南方的故鄉紀州粗曠的原始自然。1920年代佐藤春夫的台灣、福建之旅中強烈的「南方憧憬」，又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委任統治原德國領土的山洋群島所帶動的「南洋熱」之政治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川本三郎 2008: 213-20, 228-32）。從歐化的東京，到故鄉紀州的山林，再到福州與殖民地台灣，佐藤春夫藉由不斷向南移動的旅程，試圖療癒在東京都市與西方文明中生活耗損衰弱的精神。正如斯蒂芬·克拉克（Steve Clark）在探討旅遊書寫時指出「旅遊書寫作為一種形式所具有的潛在性質：旅程／追尋母題下的自我反思性、錯綜複雜的多層時態性、及其與旅遊者自身文化的寓意式共鳴（allegorical resonances）」（Clark 1999: 3）。佐藤春夫的〈霧社〉作為殖民地旅遊書寫，透過異種族通婚政策的種族交混與同化、混血女性的誘惑與威脅，再次確認了日本人與原住民的種族界線。這樣的殖民地旅遊經驗同時也引發佐藤春夫對於自身文化的反思，藉由旅遊中「自我」與「他者」不斷對話的過程，折射式地喚起日本在明治時期急速「西化」與「文明化」的種族同化歷史創傷。

二、「文明人的頭腦與蕃人的信仰、肉體」：山部歌津子的《蕃人來薩》

在佐藤春夫的〈霧社〉中，當薩拉茅事件發生時，「霧社的日本人因為蕃人蜂起而被滅絕了」這樣的消息證實只是誇大傳聞，但在十年後的 1930 年，霧社真的發生了具有種族滅絕意圖的抗日事件——霧社事件。¹² 霧社事件與薩拉茅事件雖然相隔十年，但兩者之間其實有著歷史關聯性，即在薩拉茅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已經種下了霧社事件的種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1-72）。¹³ 在霧社事件發生後不過三個月的 1931 年 1 月 20 日，山部歌津子的小說《蕃人來薩》在東京出版。¹⁴ 小說最後以原住民抗日事件作為結尾，並描述事件發生後日本殖民政府出動陸軍軍機討伐不到五百人的抗日原住民，甚至使用「陸軍科學研究所自傲的毒瓦斯」，霧社事件的影響明顯可見。

《蕃人來薩》描述泰雅族加拉排社頭目之子來薩成績優異且反應靈敏，¹⁵ 在「蕃童學校」時期就常幫忙日本官廳與會社打雜跑腿，受到日本人的喜愛與信賴，尤其與樟腦會社社員田中感情特別深厚。畢業後，來薩被任用為巡查補，因日本教育的影響，不願意接受黥面並與同族女性結婚。某日，樟腦會社主任鈴木介紹日本女性與他結婚，讓他內心充滿期待。然而，後來才知道對方是個輾轉於滿州、西伯利亞等地，年近 30 歲的日本賣春婦，被暱稱為「西伯利亞阿六」。對日本人幻滅的來薩在田中鼓勵下，決心積極學習最新的科學與技術，建立新的「蕃社」以拯救自己的種族，並與熱愛昆蟲與植物採集的鈴木主任女兒富子結為至友。後來，來薩的父親與族人因土地賠償金等問題密謀抗日，後來因為來薩被總督府選為原住民代表隨護，獻納台灣特產品至日本的明治神宮而暫時和緩，田中也求助於鈴木主任夫人與「西伯利亞阿六」以金錢援助安撫族人。然而，當來薩前往台北準備動身日本之際，在陰錯陽差之下抗日事件還是發生了，田中與鈴木夫人被斬首。事件發生後，來薩辭去巡察補官職，與「西伯利亞阿六」、富子一同居住，田中之子也放棄了東京的學業，到台灣「蕃社」傳教以為父親「復仇」。

根據下村作次郎的研究，《蕃人來薩》的故事情節與井上伊之助《生蕃記》（1926 年）中的短篇〈米卡的惡夢〉大致雷同（作者山部歌津子本身也曾證實受到〈米卡的惡夢〉影響）。井上伊之助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最早到台灣山地進行基督教傳道的日本人，被稱為「山地傳道之父」。他在日本的聖書學院唸書時，在花蓮港樟腦會社工作的父親被原住民殺害，促使他立志到台灣山地傳道。《蕃

¹² 佐藤春夫的〈霧社〉發表於 1925 年，在霧社事件後的 1936 年收錄於佐藤春夫關於台灣之旅的作品集《霧社》當中。但在作品集的後記當中，佐藤春夫回憶起 16 年前的台灣之旅，卻沒有提及 6 年前的霧社事件。

¹³ 前述官方報告書《霧社事件誌》中列為第二大原因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的反抗心」一段，記載薩拉茅事件發生之後，莫那魯道等各社頭目趁著霧社一帶的警察大多出動征伐，打算襲擊霧社殺害日本人，但事前為警方所知而未能付諸實行。然而，日本警察當局礙於當時警力不足，並未對關係者加以懲戒，反而將其編列成隊參與薩拉茅征討。事後，莫那魯道公開表示日本人藉助霧社原住民之力討伐，還餽贈禮物與薩拉茅頭目和解，因此對日本官警力量表示輕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1-72）。

¹⁴ 關於作者山部歌津子，目前所知仍相當有限，只知道牧師作家沖野岩三郎曾以她為題材創作了小說《闇を貫く》（穿透黑暗）[請附中譯]（下村作次郎 2000: 1-3）。

¹⁵ 加拉排社今為新竹縣尖石鄉嘉樂部落。

人來薩》中的田中父子即取材於井上伊之助的故事。不過，在〈米卡的惡夢〉中，介紹給原住民米卡的結婚對象為台灣賣春婦，米卡一度打算與該女性結婚，但最後還是與同族女性共組家庭，過著平和的日子。相較之下，《蕃人來薩》當中重要的變更除了原住民抗日事件的發生，還有兩個與異種族兩性關係有關的設定：台灣賣春婦改為日本賣春婦、原住民主角最後與兩名日本女性（而非同族女性）共組家庭。這三個原創的異種族關係之情節，使得《蕃人來薩》比〈米卡的惡夢〉更有效地挑戰了官方的「文明化」論述。（下村作次郎 2000: 2-6）¹⁶

首先，《蕃人來薩》在種族與性別關係上，既非井上伊之助《生蕃記》的原住民男性與台灣女性，亦非佐藤春夫〈霧社〉中「政策通婚」的日本男性與原住民女性之常見設定，而是原住民男性（來薩）與日本女性（賣春婦阿六與鈴木主任女兒）的異種族關係。作者山部歌津子身為女性，關注到帝國男性「海外雄飛」背後受忽視的女性處境。同樣地，日本女性在日本海外殖民地扮演的腳色，也與帝國對於異種族間生殖與性的管理有著密切關聯。《蕃人來薩》中與來薩關係密切的賣春婦阿六與鈴木主任女兒富子，分別為帝國在「家庭內」與「家庭外」兩個領域進行生殖與性的管理之殖民者女性類型。鈴木主任的夫人與女兒隨著他來到台灣山地，照顧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其日本式家庭生活成為被殖民者「同化」的範本。阿六來到台灣花蓮港前曾輾轉於滿州、西伯利亞，為隨著帝國軍事擴張行動而移動的賣春婦。藉由這兩種不同社會領域的女性，帝國試圖防範殖民者男性對被殖民女性的性暴力和不受控制的性交易，以避免引發性病、被殖民者男性的不滿、以及因踰越種族界線而帶來管理上的困難。

小說中，鈴木主任的女兒受到美化，在來薩對日本人幻滅時成為一種救贖。相對地，阿六則因賣春婦的身份受到眾人歧視，甚至連有良知的日本人田中也以「那種女人」指稱阿六，無法接受她的感情。雖然如此，阿六仍對於被與「生蕃」配對感到屈辱，不客氣地在來薩面前公開宣稱：「不管再怎麼落魄，我也沒打算成為生蕃的新娘呢！」（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42）。來薩雖然徹底與日本人同化，並躋身於日本下級官吏，卻仍然因為其原住民人種血統，被日本賣春婦侮辱為文明未開的「生蕃」，再次確認了「種族」位階在殖民地空間的優先性與不可改變性。然而，《蕃人來薩》中原住民男性與日本賣春婦的不尋常種族關係設定，挑戰了以男性父權為基礎的既有種族同化論述：相較於日本男性藉由殖民教育、通婚政策進行種族同化，來薩終究無法跨越種族的侷限與日本人完全同化；小說結尾來薩與阿六、富子的共同生活，也脫逸於帝國生殖與性管理單位的家庭體制常軌。

除了異種族關係中的種族與性別設定，《蕃人來薩》也藉由主角或是敘事者之口，批判日本人在現代化前後不同性質的「野蠻性」——現代化前的尚武風氣與現代化後的資本主義文化——挑戰官方「文明」與「野蠻」的種族論述。小說

¹⁶ 下村認為《蕃人來薩》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理解與同情不夠充分，結尾也顯得過於「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與井上伊之助的《生蕃記》相距甚遠，作者山部歌津子恐怕未曾實際踏入台灣山地。

中，來薩啟身前往東京前與田中餞別，談到日本本國的日本人一直到現在聽到「生蕃」兩字仍會連想為殺人魔，報紙上也動不動就出現「兇蕃」等字眼。來薩感嘆於這樣的偏見與歧視，對田中提出疑問：「可是，一直到五、六十年前，內地人自己不也是腰間配著兩刀在路上砍人，看心情斬殺或刺傷同族的無辜內地人嗎？」田中回應道：「你說的沒錯。即使是現在，雖然那種風俗已不復存在，在電影與大眾小說當中，仍作為英勇的武者風采，聚集人氣於一身呢！」（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287）。來薩口中日本人帶刀在路上濫殺無辜的「五、六十年前」，指的不外乎是日本從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的時代轉折點。《蕃人來薩》中藉由「蕃人」之口對於日本「尚武」文化進行批判，與佐藤春夫〈霧社〉中「日本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之命題同樣呈現了日本人在西方視線影響下，對於自身前現代「野蠻性」的強烈意識。同時，小說中藉由來薩等原住民的純真、貞潔與誠信，對照鈴木主任等日本人在現代資本主義下的投機、欺瞞與背叛。敘事者在評論當中，甚至將鈴木主任為了個人名利公然進行的不正行為，形容為「若在生蕃之間必然遭受斬首的嚴重不義與不信」（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168），藉由台灣原住民諺語呈現的道德觀，主張「生蕃的信仰並沒有錯，反倒是應該教化內地人，使其成為跟生蕃一樣敬奉神（祖靈）的潔淨之子」（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172）。

然而，小說中雖然批判日本的種族論述與資本主義下的道德淪喪，對於日本人帶來的基督教文化與西方科學文明，仍然給予正面評價，將其視為原住民部落與文化的救贖。在基督教文化方面，受到井上伊之助《生蕃記》相關背景之影響，顯現於小說中在東京就讀宗教學校的田中之子的腳色。小說最後，因為鈴木主任的不正行為以及種種誤解與偶然，來薩的頭目父親策動並實行抗日行動，殺害了試圖居中協調的田中與鈴木夫人，田中之子因而放棄東京的學業，來到台灣「蕃社」傳教以為父親「復仇」。在科學文明方面，佔據小說不少篇幅的昆蟲與植物標本採集和知識，揭示以科學文明「馴化」原始自然的基本命題。小說中，來薩與鈴木主任的女兒富子之間的跨種族友情來自於山地昆蟲與植物標本的採集與研究。富子在房間書架上擺放台灣蝴蝶標本的玻璃盒，透過台灣特有的昆蟲標本與日本內地的同好者交換外國的標本，並託付在東京唸農學的哥哥協助確認標本的名稱。富子對於台灣大自然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為東京的昆蟲學會與本草學會的會員，在來薩協助採集標本的過程中，甚至為來薩扮演教師的腳色。《蕃人來薩》中雖以富子對原始「自然」的興趣與親近，對照鈴木主任「資本主義」的利慾薰心，卻未意識到自然科學研究中隱含的帝國權力關係：透過科學的分類與知識，將台灣山林的動植物與原住民加以「馴服」（就像小說中釘在玻璃盒中以片假名寫上專業學名的蝴蝶所例示的），使其成為帝國支配的對象。¹⁷

更重要的是，來薩對日本人幻滅之後，田中告訴他原住民的信仰是值得珍惜

¹⁷ Sarah Irving 曾探討 17 世紀英國的帝國主義起源與自然哲學（科學）概念之關係，認為英國在大西洋的殖民活動受到帝國藉由開拓新天地回復失樂園、對地球進行全面支配此一概念之深刻影響（2008）。關於日本在台灣對動植物、礦物等進行的自然科學調查與研究，可參照李國玄 2006 的第二章〈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博物學之發展〉。

的，日本人值得學習的地方只有關於「生活的方式與方便」之「科學的知識」（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72）。田中進而勉勵來薩，與其在屈辱下擔任日本人下級官職，「不如建造新的蕃社。你要成為頭目，藉由文明人的頭腦與蕃人的信仰、肉體，在這台灣的原始林當中創造你的天地」（山部歌津子 2000 [1931]: 73）。在謳歌原住民的精神（相對於資本主義的道德淪喪）與人種優越性之同時，作者仍主張原住民在開創新的未來時，「文明人的頭腦」所代表的科學知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不僅如此，來薩在田中建言下構想的「新的蕃社」是在更深山的地方，建立一個「排除年長者而只有青年」的加拉排社。小說一開頭便描述來薩不願意黥面並與同族女性結婚，在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中，也著眼於來薩離開部落獨自居住在日本式宿舍中耽讀日文書籍雜誌，熱心跟隨山本醫師學習醫學知識與技術，協助富子採集標本，積極學習吸收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的現代文明。接受日本同化與文明教育的來薩，在規劃帶領族人追求幸福的未來藍圖當中，將耆老及其象徵的傳統全面排除，試圖和自我種族與傳統進行徹底決裂。因此，《蕃人來薩》的作者雖然藉由日本資本主義與殖民統治批判挑戰日本帝國內部的種族論述，但因其無條件擁抱西方的科學文明與基督教文化，仍忽略了這兩者與西方種族自我中心主義的共犯關係，因而複製了西方「文明」與「野蠻」的種族論述，使得小說中對於種族論述的挑戰與顛覆有其侷限。

三、「土著化」的日本警察：大鹿卓的〈野蠻人〉

大鹿卓的〈野蠻人〉於 1935 年 2 月獲得《中央公論》徵文獎，¹⁸ 小說情節雖然取材於 1920 年的薩拉茅事件，但若考慮到小說發表的時間，可以推測霧社事件的影響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親自到台灣調查霧社事件以反駁官方論點的左翼文人河野密為作者大鹿卓的妹夫，其觀點與行動對這篇小說的創作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野蠻人〉描寫礦坑老闆之子田澤在勞資鬥爭中發現自己無法擺脫資產階級身分，自暴自棄地聽從父親安排來到台灣山地當警察。派出所的警察局長井野娶泰雅族女子為妻，妻子的兩個妹妹從一開始就對田澤抱有好感，主動親近他。薩拉茅事件發生後，田澤被派往討伐，開槍射死敵方原住民後衝動砍下對方首級，更加引起原住民姐妹的愛慕。以此為契機，田澤娶姐姐泰茉莉卡爾為妻，決心變成跟原住民一樣的「野蠻人」。

小說發表半年後，大鹿卓在日本左翼雜誌《行動》上繼而發表題為〈日本的異國情調：泰雅族的生活〉的文章，說明在泰雅族文化中狩獵與出草具有重大意義，卻因日本人的誤解與不適切的農耕指導而受到負面影響。文章開頭便表示：

¹⁸ 大鹿卓（1898-1959）出生於愛知縣，哥哥為著名詩人金子光晴。小學時曾因家中事業的關係短暫移居台灣。初期創作以詩歌為主，1931 年在橫光利一介紹下於《作品》雜誌上發表〈タツタカ動物園〉（塔塔加動物園），1935 年〈野蠻人〉入選《中央公論》徵文比賽，確立其小說家地位。初期的小說以台灣山地為題材，之後則發表了以礦坑事件為題材的《渡良瀨川》、《谷中村事件》等具有社會批判意識的小說（河原功 2000: 1-2）。

「在我們棲息的同一國內，有他們這樣尚未失去原始姿態的人們存在於我們身邊，對於我們逐漸受到文明腐蝕的心而言，我認為應將其視為珍貴的存在。我們文明人不須為他們的野蠻感到恥辱，也沒有理由一定要教導他們這是一種恥辱」（大鹿卓 1935b: 60）。他認為就是因為殖民統治當局沒有認清這一點，才會在多年來的理蕃事業上耗費莫大人力與財力之後，還發生霧社事件這樣的悲劇。

與佐藤春夫的〈霧社〉一樣，〈野蠻人〉也藉由原住民抗日之種族對決與種族同化這兩個極端種族關係的交錯，來質疑「野蠻」與「文明」的官方種族論述。不過，作為虛構的小說創作，大鹿卓的〈野蠻人〉得以藉由更戲劇性的日本警察「土著化」情節，對於日本人以「文明者」姿態同化、殺害原住民的種族政策與論述，提出諷刺性的批判。在田澤與泰伊茉莉卡露的異種族婚姻當中，日本警察的「野蠻化」逐漸取代了原住民妻子的「文明化」。一開始，田澤責備妻子以手抓飯食用的習慣，後來他看到妻子笨拙地以樹枝夾小石子練習使用筷子，才發現自身「野蠻化」的不徹底，決定帶著妻子離開派出所的日式宿舍，在蕃社中建造小屋居住，讓妻子回復她原來的野性。小說結尾，田澤告知丈人老頭目他的計畫，老頭目非常高興，約好下次帶他與其他族人一起去打獵。田澤興奮地表示想跟大家一樣穿著布去打獵，老頭目便將蕃布遞給他試穿。田澤脫下身上的警察制服穿上蕃布，妻子以鍋炭在他額頭塗上刺青，丈人也親自將蕃刀掛在他的腰間。裝扮完成之後，老頭目讚嘆：「模仿泰雅族以後，內地人也變得很英勇！」眾人圍著田澤發出讚嘆與歡呼，田澤感動於「原來被征服者的熱情是如此受到壓抑」（大鹿卓 1935a: 101；2010: 120）。

荊子馨分析河野密與河上丈太郎反駁官方論點的文章時指出，原住民殖民統治問題原本是相當複雜的，在他們眼中原住民卻成了「可愛」、「可憐」和「迷人的」單純的存在，不具任何深度感，結果是「複製了殖民污名化的另一面：對土著的浪漫化」（荊子馨 2006: 201-02）。荊子馨同時批判，河野密等人基於左翼立場將原住民的抵抗「納入『勞動運動』與『民族解放問題』這類熟悉的母國基進論述當中」，挪用霧社事件來對抗「帝國主義、軍國主義以及獨裁統治」。因此，他們沿襲了「日本人」與「蕃人」的二元對立，無條件肯定日本人的「本體論地位」，而原住民「只能以其原始凶殘或原始美麗的方式存在；他者只被看成是凶惡的加害者或無助的受害人」。他進而分析大鹿卓的〈野蠻人〉，認為這篇小說中「對野蠻的幻想式認同」，跟河野密基於左翼立場的觀點一樣，不但沒有超越、甚至更強化了「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

〈野蠻人〉這個泛稱性的標題，似乎是在強調一個理當是文明的日本民族及其殖民教化任務所展現的野蠻性。這個自我反思的態度——發現內在的野蠻性——是建立在鞏固與延伸外在的野蠻性之上，雖然作者努力想將野蠻安置到文明當中，但這兩個詞彙——它們不是殖民現代性的結果而是其根本構成——的二元對立結構依然原封未動，並因此而更形強化。（2006: 201-02）

如同荊子馨所言，〈野蠻人〉當中日本警察田澤的「土著化」只是將官方種族論述中「文明」與「野蠻」的價值進行 180 度翻轉，實際上並未能從根柢動搖該二元對立結構。然而，大鹿卓對於這樣的侷限性似乎是有所自覺的。在小說當中，徹底「日本化」與「文明化」的警察局長原住民妻子在外表、語言與舉止等「外在」層次都與日本女性無異，但敘事者細膩描述她「額頭的厚重白粉下有著刺青呼吸著，彷彿無法拭去的憂愁一般」（大鹿卓 1935a: 70；2010: 80）。正如佐藤春夫筆下的尤娃莉羅拔歐無法受到同化的人種身體特徵與姿態，原住民妻子厚重的白粉下「呼吸著」的刺青，透露了外表、語言與舉止的表面同化無法改變的內在人種本質。

正如原住民的「外在」同化無法抹滅其「內在」人種本質，小說結尾也暗示田澤「土著化」的成功其實只是表面的。穿戴蕃布、刺青與蕃刀等原住民「外在」種族標誌（同時也是種族烙印）受到老頭目與族人盛大歡呼的田澤，衝出洋溢著「獸的臭氣與獸的興奮」之蕃社小屋，被屋外騷鬧著的泰雅族人圍在正中央。但令人不解的是，受到泰雅族人英雄式歡呼圍繞的田澤，卻被描寫為「就像剛被關到籠子裡的野獸一樣，開始左來右往走動」（大鹿卓 1935a: 101；2010: 121）。徹底變身為「野蠻人」的田澤不是成為他嚮往的大自然野性下「呼吸著擴展胸懷的大樹」，或是奔馳於林中的野獸，而是成為「被關到籠子裡的野獸」：小說結尾這個出人意料的「籠中困獸」意象，暗示著田澤看似順利完成「土著化」與「野蠻化」，但他的種族同化逆向操作，事實上不過是在日本種族論述牢籠當中受到侷限的「左來右往走動」，無法獲得真正的解放。由此可窺見，作者大鹿卓對於種族同化（不管是「文明化」或「野蠻化」）的侷限性是有所自覺的。

不僅如此，〈野蠻人〉當中還藉由「自然」的換喻，將「野蠻性」視為人類共通的先天性本質，挑戰原住民為「野蠻人（＝非人類）」之種族論述。小說中，從討伐行動歸來的田澤帶回敵方首級，原住民妹妹泰伊莫那莫若無其事地走近頭顱，叫頭顱將其父母、兄弟的頭顱也都召喚來這裡。相對於泰伊莫那莫這個未滿十五歲的少女對於獵人頭的習以為常，田澤回想起自己在莫名衝動下砍下敵人屍體頭顱，對於自己的殘虐行為卻感到萬般懊悔，讓田澤發現自己「在精神上的脆弱」：

面對還未滿十五歲的泰伊莫那莫這樣的態度，他就像遭受重重打擊般地體會到自己在精神上的脆弱。他不認為這只是粗暴的風俗支配著她的心理，而是感覺似乎嗅到從血液傳送到血液的野蠻性令人噁鼻的臭氣。不，不能只是將其單純地稱為野蠻性。那野蠻性，是與受到大自然無情肆虐、同時又在其吝嗇慈悲下呼吸擴展胸懷的大樹那叛逆精神互通的嚴肅脈動。樹液源源不絕地流動，從細小的樹枝末端噴濺出來。相較之下，自己充其量就只不過是剛移植的虛弱樹木而已。（大鹿卓 1935a: 84；2010: 97-98）

引文中首先將原住民少女面對頭顱的泰然態度解釋為「從血液傳送到血液的野蠻性」，但隨即又否認「野蠻性」只是基於血統的人種特質，而是潛存於人類血液中的普世性內在本質，就像在大自然的肆虐與慈悲下求生存的大樹一樣。相較之下，在西洋化與文明化過程中喪失人類「本性」的日本人，就如同「剛移植的虛弱樹木」般脆弱。就在大自然野性的呼喚下，田澤主動加入危險的討伐行動，希望在「廣大自然的狂野呼吸與人類的原始鬥爭中鍛鍊自己。要在自己的血管中，讓祖先的血源源不絕地流著，讓祖先激烈的血超越漫長歲月在自己身上重新甦醒」(大鹿卓 1935a: 87; 2010: 102)。

藉由仇恨與親密的種族辯證，田澤不但超越了自己與生俱來的資產階級身分，超越了日本警察的殖民地身分，也超越了日本人在「文明化」過程中喪失自我人種「本性」的歷史創傷，重新與「廣大自然的狂野呼吸」合而為一。綜觀整篇小說，大量使用繁茂的樹木、沙沙作響的樹葉、林中的野獸等樹林野生生態相關意象來比喻原住民的生命力量，在田澤「土著化」的過程中，成為不斷召喚、慫恿與感動他的「內在野蠻性」之象徵。相較於佐藤春夫〈霧社〉中與原始山林共生的原住民文化相對照的日本「新蠻風」，或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中以西方科學文明「馴化」台灣山林的自然與原住民，在大鹿卓的〈野蠻人〉當中，與原始自然密切結合的「野蠻性」成為人類固有的生命力量。〈野蠻人〉將「野蠻性」定義為跨越人種的人類共通生命力，消弭了「文明」與「野蠻」的種族界線，也挑戰了將「人類」與「自然(非人類)」加以區分的既有種族論述。

四、原住民「最後的格鬥」：中村地平的〈霧之蕃社〉

相較於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直到小說結尾處的原住民抗日事件才呈現霧社事件之影響，或是大鹿卓〈野蠻人〉藉由薩拉茅事件間接反思霧社事件，中村地平的〈霧之蕃社〉則直接以霧社事件為主題，¹⁹ 事件相關人物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近藤儀三郎、郡守小笠原敬太郎等人均以真實姓名登場，事件的原因、經過與結果也大致依循官方調查報告等史料記載(阮文雅 2005: 109-13; 邱雅芳 2009: 175-77)。²⁰ 然而，小說中透過文學的想像力，將歷史紀錄中一語帶過的情節加以鋪陳，尤其著眼於兩性關係在霧社事件中扮演的腳色，在種族與性的交界處詮釋此一具有種族滅絕意圖的抗日事件。

¹⁹ 中村地平(1908-1963)出生於宮崎市，受佐藤春夫影響對「南方」有所憧憬，選擇到台灣的台北高等學校就讀，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美術史科。東大在學期間發表處女作〈熱帶柳的種子〉，受到佐藤春夫讚賞，1935年成為《日本浪漫派》同人，並開始與真杉靜枝同居。1941年12月受徵召為陸軍宣傳隊員，到新加坡與馬來半島一年。關於中村地平的生平與作品，參照阮文雅 2005。

²⁰ 根據阮文雅的研究，〈霧之蕃社〉因為取材於官方報告，小說中霧社日本警察的寬容形象、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不願意配合抗日行動等描寫，與鄧相揚等人近年來的歷史研究與口述資料有所出入(2005: 109-13)。邱雅芳也曾在論文中具體分析〈霧之蕃社〉的情節設定如何突顯原住民的野蠻性，並給予日本官吏正面的描述(2009: 175-77)。

岡林稔將 1938 年中村地平以故鄉九州宮崎的風土為根基寫成的〈南方通信〉(1938)，視為其「南方文學」實踐的起點。他回溯《日本書紀》、《古事紀》中宮崎作為天皇開天闢地舞台的神話傳說，與保田與重郎等其他《日本浪漫派》同人的鄉土回歸具有相通之處；然而，中村地平的鄉土回歸旨在透過南方的「俚俗」故鄉，進行個人的精神根源追尋，而非如保田等人回歸以天皇為中心的「風雅」古典世界，進而走向積極的戰爭協力。因此，他 1939 年來台環島旅行的產物〈蕃界之女〉與〈霧之蕃社〉透過「文明」與「野蠻」的相剋，表達對原住民逐漸受到文明滅絕的野性表達同情與哀悼（岡林稔 2002: 96-121）。〈蕃界之女〉取材於他造訪東部原住民部落的經驗，小說中批判總督府對原住民的同化與文明化，並以原住民夫婦天真無邪、不受文明污染的特質，對照日本敘事者在東京都會生活中不幸福的婚姻，展現作者在南方憧憬中的原初主義（primitivism）傾向。相較之下，〈霧之蕃社〉改編種族衝突的歷史事件，對台灣原住民的原始生命力進行浪漫化之際，呈現了**充滿多義性的複雜種族概念**。

首先，小說發揮文學的想像力，再現狄娃絲魯道與近藤儀三郎的異種族婚姻及其失敗過程。從婚後狄娃絲魯道滿足於日本式生活，兩人出發至花蓮赴任途中的興奮，近藤在花蓮平地意識到「生蕃」妻子帶來的異樣眼光，一直到近藤的失蹤，詳細鋪陳在官方報告書《霧社事件誌》中僅以短短數行交代的婚變過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0-71）。針對小說中狄娃絲魯道滿足於與日本巡查的異種族婚姻，並努力成為日本妻子的描述，李文茹認為這反映了「帝國男性的自戀」，將狄娃絲魯道塑造成「父權制社會構造下帝國女性的刻板形象」（李文茹 2004: 141）。在中村地平筆下，近藤儀三郎有別於利用異種族通婚「以夷制夷」後始亂終棄的哥哥近藤勝三郎（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0），²¹ 而是苦惱於娶「生蕃」為妻的自卑感，同時對努力「日本化」的妻子充滿同情，甚至意圖與妻子一同跳海自殺的「善良」日本人。更重要的是，小說中近藤失蹤後，由哥哥莫那魯道帶回山上的狄娃絲魯道與同社的蕃人再婚，迅速回復「原始」的狀態：

坐在榻榻米上起居的生活必須永遠放棄了。坐在地上用手抓東西吃飯，光著腳上床鋪睡覺，必須回到野蠻的生活方式。可是，自從再婚之後，她看起來像是完全滿足於與新男人的生活。至於與近藤的過去，愉快的新婚時期當然就不用說了，即使是悲傷的生離死別記憶，再怎麼看都像是完全從腦海中消失了一樣。她以吸收山靈精氣而回復健壯的身體，奔馳到山林當中追逐山豬，或是高興地到田裡播撒蕎麥的種子。（中村地平 1941: 23）

相較於〈霧社〉中作不協調日本人打扮的尤娃莉羅拔歐、《蕃人來薩》中的日本

²¹ 根據前述《霧社事件誌》的記載，1910 年近藤儀三郎要娶狄娃絲魯道時，他的哥哥近藤勝三郎 1909 年拋棄尤娃莉羅拔歐以入贅於荷歌社頭目之妹一事，也成為莫那魯道一開始反對的重要理由之一（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0）。1918 年近藤勝三郎又拋棄了做為他妻子的荷歌社頭目之妹。

巡查補來薩、還有〈野蠻人〉當中的警察局長妻子與日本警察田澤的種族同化，中村地平〈霧之蕃社〉中的狄娃絲魯道則完全否定了種族同化的可能性。小說中，丈夫失蹤後她與族人再婚並「回到野蠻的生活方式」，完全沒有留下種族同化的痕跡。尤其是，回到原始山林之後，她作為原住民人種的「身體」再也不必勉強適應日本民族的打扮與生活習慣，吸收了「山靈精氣」而重新恢復元氣。小說中沒有提到狄娃絲魯道再婚後生的兩個女兒接連病死的後續不幸發展，²² 而是將敘事停留在狄娃絲魯道天真無邪地回到「野蠻的生活方式」之階段，強調了原住民與原始山林合為一體的種族文化為外在因素無法改變的生理本質。

除了狄娃絲魯道失敗的異種族婚姻激發莫那魯道的仇恨，〈霧之蕃社〉中根據官方報告書記載所鋪陳的另外三個主謀角色參與抗日事件的動機，其中有兩個也與兩性關係有關。其中一人因為被花心的妻子拋棄而受到族人歧視，另一人則因天生殘障與怠惰而娶不到老婆，希望藉由抗日事件獵人頭獲得族人尊敬。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抗日行動的勇氣與武力不是日本人眼中的「野蠻」暴力，而是為了表現「男子氣概」以獲得族人認同。更重要的是，面臨日本人帶來的種族滅絕危機，種族內部的「男子氣概」展示轉化為異種族男性之間競爭的重要動力；小說當中對於種族內部與種族之間兩性關係的關注，突顯出霧社事件作為種族生存戰爭的性質。

值得玩味的是，作者藉由喪失女性生理機能的中年婦女，來表現驅使抗日原住民鋌而走險進行種族反抗之生理因素。小說中描述，除了莫那魯道與前述三個主謀之外，「自認為若無法藉由獵人頭來試圖達成命運的轉換，在蕃社生活中將邁向個人破滅的人，實在是多得數不清」（中村地平 1941: 39）。他以即將喪失青春的中老年婦人之不合常軌行動，形容原住民抗日行動：

日本的理番政策日益成功，他們素樸的野性逐漸在所謂的文化面前，不得不邁向屈服與衰弱。他們的民族凶暴性與原始性，就好像是生理上作為女性的機能逐漸喪失的中老年婦人的活力一樣，已經從頂點開始下降。在這美麗群山圍繞的多霧部落中，陷入絕境的疾患末期的症候也在體內各處顯現出來。

然後，眼看著就要步入老年的婦人，因著對青春的思慕與執著，加上生理的焦慮與煩悶，有時會出人意料地作出不合常軌的行動。同樣地，蕃人在燃燒剩餘的殘蠟般的野性與凶暴性的驅使下，衝動地試圖對不合他們本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明——進行最後的格鬥。（中村地平 1941: 39）

正如小說在描寫霧社事件本身的場景中沿用官方修辭，以「無知」、「凶暴」形容殺害日本人的原住民，上述引文也以「凶暴性」、「原始性」與「野性」作為原住

²² 官方報告中指出，狄娃絲魯道的悲慘下場以及官方沒有給予任何撫恤，也是造成莫那魯道反日情緒的原因之一（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0: 371）。

民的民族本性。然而，引文中作者同時也表達了他對抗日原住民進行「最後的格鬥」之理解與同情。藉由即將喪失女性機能的中老年婦人之生理性比喻，作者突顯了原住民在日本「理蕃政策」與「文明化」下過著「不合他們本性的生活方式」，不僅受到去勢（陰性化為女性），甚至連「再生產」的能力也逐漸喪失。基於此，作者以「陷入絕境的疾患末期的症候」之身體意象，比喻原住民面臨種族滅絕的生存危機，將霧社事件視為種族瀕死的抵抗。

中村地平曾在〈南方的文學〉一文當中，揭示「南方文學」對於封閉於個人陰暗內面的日本文學可能提供的刺激：「日本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理由，無法產生南方的文學具有的種種優點呢？發生於南方的文學，世界共通地有著諸如明亮、樂天性、行動描寫的卓越、感覺的詩意、神話的空想力、熱情的飛躍性等特徵，我認為這些特徵可成為日本文學新的要素加以發揮」(中村地平 1971 [1940]：47-48)。綜觀整篇小說，中村地平在歷史史料記載的骨架基礎上添加文學想像的血肉時，台灣原住民文化中的「明亮、樂天性、行動描寫的卓越、感覺的詩意、神話的空想力、熱情的飛躍性」等特徵，都構成了敘事的基調。小說後半以悲壯的語調述說原住民遭受日本討伐的下場：原住民女性與小孩為了支持即將決戰的男性而集體自縊，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切腹自殺，莫那魯道在部下與族人自縊後消失於山林中，莫那魯道次男帶著部下自縊前，以即興詩歌與舞蹈獻給已喪生的妻子與長子。在這些場景當中，原住民「南方」文化中的詩意、神話性與熱情等特徵滲透於敘事的字裡行間，呈現原住民充滿種族、部落與家族之「愛」的普世性人性與情感，與官方論述中使用「兇蕃」等語強調人種差異與污名化，形成顯著對比。

然而，敘事者同時也從日本人的觀點，描述日本人聯合「我方蕃」大舉討伐「兇蕃」的經過。小說最後充滿詩意的場景，也聚焦於窮途末路的抗日原住民如何切腹或自縊，而完全沒有提及日本人違禁使用毒瓦斯炸彈、第二次霧社事件等殘暴的報復行為，也就是以抗日原住民悲壯的自我了斷與種族滅絕，遮蔽了日本人討伐行動的暴力性。小說結尾並從日本人討伐隊與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的角度，將花岡一郎兄弟選擇切腹自殺、原住民婦孺穿著知事贈送的日本衣服集體自縊等，解釋為日本同化教育與撫育的成果。〈霧之蕃社〉一方面對台灣原住民面臨種族滅絕的危機表達同情與理解，以浪漫化的詩意筆觸描寫原住民的「南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依循官方的種族論述，將霧社事件歸因為台灣原住民難以馴服的「野蠻性」，並強調種族同化的成果，以緩衝在「模範部落」的霧社發生具有種族滅絕意圖的抗日事件之政治打擊。

尾崎秀樹曾指出，〈霧之蕃社〉「不過是對於南方懷抱鄉愁、憧憬與愛的作家中村地平托寓其異國情趣的素材」(尾崎秀樹 1971: 234)。然而，如果我們將中村地平「南方文學」之精神漂泊放置在其他《日本浪漫派》同人與帝國「南進」政策的歷史關係當中來看，則〈霧之蕃社〉對於原住民抗日事件的書寫就無法以單純的「異國情趣」或是「文明與野蠻的相剋」來解釋，而是呈現了複雜的種族概念。如前所述，其他《日本浪漫派》同人訴諸時間上天皇「萬世一系」的「風雅」

鄉土，進而基於自我種族中心主義擁護天皇體制、進行戰爭協力。相對地，中村地平的鄉土回歸指向空間上作為日本南方的「鄙俗」故鄉宮崎，進而飄洋過海邁向殖民地台灣的原住民文學、文化與歷史的「南方性」。也就是說，即使在戰爭陰影籠罩下，「南方」的種族與文化形成一股離心力，促使中村地平文學中的種族想像無法完全被天皇國家的民族統合邏輯所收編。

作為戰時天皇體制與「南方文學」拉鋸下的產物，〈霧之蕃社〉除了在敘事觀點上呈現種族論述的內在分裂，小說中藉由種族之間或種族內部的兩性關係，在生物學「人種」存滅與歷史文化「民族」同化之間進行複雜的辯證，彰顯了殖民地種族同化與統合的政治侷限性。不管是狄娃絲魯道失敗的異種族婚姻，或是霧社事件主謀者參與動機與種族內兩性關係的密切關連，小說所突顯的都是跨種族與種族內的兩性關係在霧社事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藉此，作者間接指出異種族的「性」的交混不但無法達成種族同化的目的，反因為關乎種族的延續與生存，而成為異種族或同種族男性之間「男子氣概」競合的衝突點，導向霧社事件種族對決與滅絕之慘劇。

結語：黃種人帝國下種族差異的政治學

綜合以上的討論，佐藤春夫〈霧社〉中歷經異種族婚姻的尤娃莉羅拔歐成為日本人的「奇異」諧擬，並透過森丑之助批判自居「文明人」的日本人帶來「新蠻風」；山部歌津子的《蕃人來薩》批判日本人在現代化前後不同性質的「野蠻性」；大鹿卓〈野蠻人〉中的田澤在婚姻、獵人頭等另類異種族同化與交混過程中，藉由台灣原住民的「外在野蠻性」，「發現」日本人在「文明化」過程中受到壓抑的「內在野蠻性」；中村地平的〈霧之蕃社〉對於「文明」與「野蠻」進行自我矛盾的詮釋。不同世代與不同立場的日本作家，分別針對日本人與台灣原住民之間仇恨與親密的交錯，進行各種不同的種族辯證，屈折映照出日本人自身的種族認同糾葛：日本人在西方種族視線與陰影下努力進行「外在」模仿以成為「文明人」，並貶抑殖民地「野蠻」種族以建立「文明人」認同，卻無法擺脫人種自卑感與種族同化的歷史創傷。

馮檢基·庫珀（Frederick Cooper）曾指出，與其側重殖民主義如何對殖民者／被殖民者等差異進行「統治」，「強調差異的政治學可能更為有效，因為差異的意涵總是處於競合的狀態而鮮少是穩定的」（2005: 23；強調為原文）。事實上，西方帝國也曾出現基於浪漫原初主義傾向肯定原住民的種族本性與文化，以對現代文明進行批判，並對歷史展現悲觀主義的「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論述（Ellingson 2001）。²³瑪麗安娜·托高威內克（Marianna Torgovnick）研究現

²³ 一般認為「高貴的野蠻人」神話源自十八世紀中期標榜「自然」生活的盧梭，但特·艾林森（Ter Ellingson）根據史料考察提出的論點為：十八世紀時該論述並沒有廣泛為知識份子或大眾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民族學會（Ethnological Society）會長約翰·克羅福德（John Crawfurd）基於種族歧視主義，將「高貴的野蠻人」神話加以「神話化」，以對其進行批判，才造成該神話存在已久的印象（Ellingson 2001）。

代與後現代時期西方文化人對於非洲、南洋等地文化迷戀之專書中，也提到西方的「原初主義」迷戀與其自身的認同危機有關：一方面必須明確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界線，一方面又想要體驗另一種有異於現代主體的可能性（Torgovnick 1990: 157）。

本文的討論顯示出，作為後進黃種人帝國，日本殖民政府面對台灣的原住民，試圖以人種交混超越生物學的差異，以民族同化超越歷史與文化的差異，以進行帝國的管理與統合。在此實踐過程中，「野蠻」與「文明」的種族差異並非截然的二元對立，而是處於屈折的辯證與「競合的狀態」，呈現日本自身種族認同建構的內在矛盾。自身的種族同化歷史經驗與創傷心理，使得日本文化人以更為屈折的方式，對台灣原住民及其文化感受到詩意、浪漫、誘惑、讚嘆與同情，想像或嚮往另一種有異於現代（西洋化）主體的可能性：即與原始自然、部落共同體與傳統合為一體的「原初」存在。在此過程中，「性」作為種族繁衍的手段，以及「自然」作為人類原初生命力的表徵，都複雜地介入上述殖民地種族差異的辯證中。就在「種族化的性」（racialized sex）與「性別化的種族」（sexualized race）的糾葛當中，日本作家透過仇恨與親密這兩個種族關係極端的交錯，批判奠基於「人類」與「自然（非人類）」對立的帝國暴力與文明論述，對台灣原住民與自然共生的種族生活與文化，展現恐懼、誘惑、憧憬、鄉愁等複雜糾結的反應。然而，他們在挑戰既有種族論述之同時，也受到種族身分與所處時代的限制，複製了西方種族論述的內在結構與邏輯，就像大鹿卓〈野蠻人〉當中的日本警察田澤，即使順利擺脫文明化外表回復祖先時代的「野蠻人」狀態，依舊只是「籠中困獸」。

引用書目：

- 下村作次郎。2000。〈山部歌津子『蕃人ライサ』解説〉。山部歌津子 2000:1-8。
大鹿卓。1935a。〈野蠻人〉。《中央公論》50.2(2月号): 67-101。
——。1935b。〈日本のエキゾティシズム：タイヤル族の生活〉。《行動》(8月号): 60-63。
——。2010。〈野蠻人〉。蔡建鑫譯。王德威，黃英哲主編。《華麗島的冒險：日治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故事》。台北：麥田。75-121。
山部歌津子。2000 [1931]。《蕃人ライサ》。河原功監修。《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台灣編】》四。東京：ゆまに書房。(初出：東京：銀座書房，1931。)
川本三郎。2008。《大正幻影》。東京：岩波書店。
中村地平。1941。〈霧の蕃社〉。《台灣小説集》。東京：墨水書房。1-66。
——。1971 [1940]。〈南方的文学〉。《中村地平全集》。東京：皆美社。第三卷。47-48。(初出：《知性》1940年9月。)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0。《霧社事件誌》。戴國輝。《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と資料》。東京：社會思想社，1981。349-520。
佐藤春夫。1925。〈霧社〉。《改造》7.3(3月): 2-34。
——。2002。〈霧社〉。《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邱若山譯。台北：草根。149-90。
坂野徹。2005。《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1884-1952年》。東京：勁草書房。
尾崎秀樹。1971。〈霧社事件と文学〉。《旧植民地文学の研究》。東京：勁草書店。
李文茹。2004。《帝国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李國玄。2006。《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博物館學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阮文雅。2005。《中村地平研究：「南方文学」の理想と現実》。広島：広島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科博士論文。
岡林稔。2002。《《南方文学》その光と影：中村地平試論》。宮崎：鉦脈社。
河原功。2000。〈大鹿卓『野蠻人』解説〉。《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台灣編】》六。東京：ゆまに書房。1-6。
——。2004。《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莫素微譯。台北：全華。
邱若山。2002。《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台北：致良出版社。
邱雅芳。2009。《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荊子馨。2006。〈從叛變者到志願兵：霧社事件以及對原住民的野蠻與文明再現〉。《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183-232。
陳偉智。2009。〈自然史、人類學與台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台灣地方歷史分析〉。《台灣史研究》16.4(12月): 1-35。
森丑之助。2008。《台灣蕃族誌第一卷》。台北：南天書局。(初出：臨時台灣旧慣調査会，1917)
楊智景。2008。《日本領有期の台湾表象考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植民地表象》。東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蜂矢宣朗。1991。《南方憧憬：佐藤春夫と中村地平》。台北：鴻儒堂出版社。
Anderson, Kay. 2008. “‘Race’ in Post-Universalist Perspective.” *Cultural*

- Geographies* 15.2: 155-71.
- Barclay, Paul D. 2005. "Cultural Brokerage and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Colonial Taiwan: Japanese Subalterns and their Aborigine Wives, 1895-193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May): 323-360..
- Bhabha, Homi.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Clark, Steve, ed. 1999.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Transit*. London: Zed Books.
- Cooper, Frederick. 2005.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unt, Martin, and Halpern, Rick, ed. 1999. *Empire and Others: British Encounters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1600-185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Ellingson, Ter. 2001.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skildsen, Robert. 2002.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2: 388-418.
- Irving, Sarah. 2008.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 Nagel, Joane. 2003. *Race, Ethnicity, and Sexuality: Intimate Intersection, Forbidden Fronti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rgovnick, Marianna. 1990.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ual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